

《中華新報》：清季嶺東地區中國同盟會 創屬革命報刊之輿論先驅和鼓吹陣地

施欣

摘要：創辦於清末廣東嶺東地區的《中華新報》是一份隸屬同盟會的報紙，由謝逸橋等革命黨主持筆政。該報大力宣傳民族革命思想，主張推翻滿清王朝、顛覆專製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家；大量引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愛公正學說，大力推廣西方社會近代民主民權思想；積極宣揚“孫文主義”，闡釋並普及“三民主義”理論；與孫中山、陳少白海外創辦的《民報》《中國日報》聲氣相投、互為犄角，迅疾成為粵東地區乃至整個嶺南全域聲名鵲起、一時無兩的資產階級革命報紙。

關鍵字：謝逸橋 《中華新報》 輿論陣地 中國同盟會 革命報刊

Founded by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in Lingdong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 *Chinese Times* Was a Pioneer of Public Opinions and an Advocacy of th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SHI Xin

Abstract: Founded in the Lingdong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Times* (*Zhong Hua Xin Bao*) was a newspaper und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presided over by Xie Yiqiao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parties. The newspaper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ideas of national revolution, advocating the overthrow of Qing Dynasty, th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ourgeois democratic republic. It introduced bourgeois democratic republic, freedom and equality, universal love and justice theories,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modern democratic and civil right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also accelerated the "Sun Yat sen Doctrine", interpreted and advocat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 people* (*Min Bao*) and *China Daily*, founded overseas by Sun Yat sen and Chen Shaobai, shared the same spirit and were at odds with each other. They quickly became well-known and unparalleled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in the eastern Guangdong and

【作者簡介】：施欣（1984-），江西宜春人，湖南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仲愷農業工程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史。

even in the entire Lingnan region.

Key words: Xie Yiqiao; *Chinese Times*; public opinions; China League of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引言

謝逸橋（1874—1926），原名錫元（也是族譜名），又名元驥、延懿，字逸橋（也作乙橋），廣東嘉應人（今梅州市梅縣區松口鎮銅琶村人，梅州古稱嘉應州），既受過傳統儒學教育沁潤、又深受著西方近代思想熏染。自宋以降，廣東沿海地帶一直存在入海跨洋、涉遠謀生和闖蕩東南亞、美洲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家族傳統，如潮汕地區及五邑地區移民海外、定居南洋華僑華人眾多，直至今日僑胞遍布世界各地。謝逸橋出生於富商大賈的華僑家庭，祖父謝益卿少時迫於生計出洋謀生，先後在南洋的婆羅洲和馬來西亞的檳榔嶼經商，因頭腦聰慧、經營得法且抓住商機而獲貲不菲，漸漸累積起財富轉而置辦產業^[1]。辛亥革命功成後，並不熱衷於從政和當官的他悄然返回家鄉、隱居於桑梓的輝宗樓，篤志從事慈善、教育、賑濟、交通等公益事業和實業。綜其一生，謝逸橋既是近代廣東愛鄉愛國華僑華商的優秀代表，也是資產階級先進知識分子和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宣傳家、報刊家和實業家。他的人生履歷與革命領袖孫中山有極高相似度，早年投身資產階級革命，晚年功成身退致力實業建設。

晚近以降，面對“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2]的悲慘處境和現實境況，愛國主義的種子在謝逸橋內心深處悄然紮根發芽、以身許國的情愫在他心中潛滋暗長。綜觀他革命的一生、報國的一生、辦報的一生，始終高舉愛國的大纛、高擎民族振興的旗號，奠定了深懷家國情懷、追逐光明理想的人生基石。1905年，抱持“志澄天下”夙願的謝逸橋毅然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現代的統一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因其崇高威望被推選為總理，作為孫中山革命同志的謝逸橋被公選為嶺東地區的“主盟人”，成為該黨早期重要成員和推翻清王朝的骨幹分子。作為孫中山革命的有力臂膀和得力助手，逸橋一生追隨孫先生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和“推翻帝製，締造共和”而不懈奮鬥。

入盟之後，謝逸橋反清倒滿的堅定政治立場和矢志建立共和國家的政治理念，深得同盟會同志的贊許與欽佩，也深受孫中山的信任與倚賴，迅速成為孫中山及同盟會的重要骨幹和得力幹將。作為兼具傳統文化知識分子特質與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謝逸橋，毅然與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訣別、與黑暗落後的舊社會割裂，為推翻腐朽沒落、行將就木的滿清王朝奔走呼號，為贊助粵省內外各地武裝起義、會黨舉義而不辭辛勞；積極發展盟友、廣泛聯絡盟員、壯大同盟會粵

東組織和力量；組織會黨力量、發動武裝起義、配合孫中山在各地發起武裝鬥爭；呼籲各界捐款，籌措發難經費。

1907年，同盟會骨幹謝逸橋在汕頭創辦的聞名遐邇的《中華新報》，由他本人親自擔任董事長並兼任主編——主持報紙言論及日常報務；此外，他還邀請陳去病、葉楚傖等國內著名報人及報刊評論員、政論家擔任主筆和介入筆政，使得該報一時大咖雲集、聲勢浩大，迅速成為潮汕梅等地同盟會機關報和輿論喉舌。同時報社也是該地區同盟會的秘密聚集點、聯絡點和臨時會議場所、指揮中心，許多重大政治活動、軍事行動的策劃和商討均在此舉辦。該報的誕生，改變了之前因同盟會處於隱秘狀態造成的革命宣傳不普及的下風位置和反清輿論造勢不突出的被動局面，不僅開辟了梅汕潮等嶺東地區和廈漳泉等福建沿海地帶的廣大革命宣傳陣地、擴大了革命思想潮流傳播的範圍和影響，而且喚醒和帶動了嶺東區域更多革命志士投身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

一、《中華新報》橫空出世的社會政治環境及歷史文化背景

清末民初，創辦於廣東嶺東地區的《中華新報》是一份隸屬於早期中國同盟會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報紙，由謝逸橋等人創建並“總理”筆政和言論。該報極力鼓吹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主張社會鼎新、思想維新、政治刷新、風俗漸新，致力於營造濃厚的排滿倒滿鬥爭氛圍，召集愛國的志士仁人（愛國華僑、新軍士兵、會黨等地下秘密結社組織）舉事或起義，是資產階級革命黨布局和挺立在潮汕梅一帶的重要思想宣傳戰線及輿論前沿陣地，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政治言論及輿論宣傳的機關報，而且也是秘密聯絡同志、進行革命活動的樞紐機關。

（一）嶺東地區如火如荼、不斷高漲的資產階級革命形勢

近代以來，地處沿海地帶的廣東得風氣之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多元文化、資產階級社會思潮及工業社會異質文明的深度影響，或者說面對西方思想及文化的“東漸”廣東沿海首當其沖。清季民初，列強的侵略孔亟、清廷的高壓統治、大量的戰爭賠款以及地主階級和外國勢力的雙重剝削與壓榨，必將引起人民的激烈反抗、必定激發群眾的奮起抗爭。再加上嶺東地區本來就長期活躍著民間秘密組織——會黨（如洪門），他們以推翻清帝、驅逐滿清為志業，秘密潛伏、地下活動、伺機而起、待時而發。經過孫中山等人的革命宣傳與輿論鼓動，嶺東地區的反清排滿思想及風氣在潛滋暗長，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裝力量正集聚著、蟄伏著，只等時機成熟、一旦發動便會電光火石。這一切，都促使了革命形勢日漸高漲，致使廣東東部沿海地域的革命形勢猶如星火燎原。

受孫中山、黃興、陸皓東、謝纘泰、史堅如、馮自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人士的深度影響，

廣東東北部特別是三省結合部地區——即清王朝及資本 - 帝國主義列強統治力量薄弱和管理鞭長莫及的地帶，成立了同盟會早期革命組織，積極從事地下舉義活動，同盟會的政治勢力因此而延伸和拓展到了潮汕梅及其周邊地域。自嶺東同盟會成立後，謝逸橋等革命派接連開展了一系列紮實高效的工作：首先，在當地反清志士及會黨當中發展了一大批會員和骨幹，使得嶺東同盟會的政治力量、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宣傳力量等得以充實。洪門、天地會、天理教等會黨力量長期蟄伏在民間，遇有時機便會揭竿而起。其次，革命黨人在嶺東地區大規模、大範圍、大頻率進行各種軍事、政治、思想文化、宣傳輿論方面的鬥爭。這些鬥爭有的是秘密的、悄悄的，而有的則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如創辦了體育傳習所、師範傳習所等“地下”黨派機構，慢慢滲透進潮汕梅揭地區的舊衙門、新軍、政治社團、立憲會等社會組織。第三，嶺東同盟會還非常注重網絡各路人才、搜集各界菁英，吸納和聚攏了大批具有堅定民族革命意志、強烈反滿意識及反抗精神的、以海外留學生為主的新型知識分子與進步青年和會黨分子，如姚雨平、古直、丘哲等青年革命骨幹及優秀軍事人才——他們在發動反清武裝起義、舉行革命活動方面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成為起義的中堅力量和顛覆滿清的先鋒隊。

革命派要求突破黑暗、爭取光明，革命黨人主張推翻專製、建立共和，革命力量在集結、革命行動在醞釀、革命風氣在積郁，人心思變，激變蟄伏，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終於，在孫中山、黃興等人的直接領導或間接促動下，積極聯合三合會、洪門以及地方門道勢力等以“反清”為政治目標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還利用帶有雇傭軍性質（如日本浪人）的軍事力量，先後組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潮州、黃岡等地武裝起義，進行了不少行刺、暗殺、闖營等革命活動，令本以千瘡百孔、焦頭爛額的清廷更加心神惶惶、寢食難安，也促使該地區革命勢力得到迅猛發展和壯大。與此同時，經過多次、反復的武裝起義和不懈、持久的革命宣傳，同盟會革命綱領、政治訴求及辦會方針逐步浸潤頭腦、深入人心，“民風為之丕變”，群眾從以往的麻木觀望轉為同情和支持革命。

（二）《中華新報》創建的報刊環境、媒體空間和輿論態勢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此時迫切要求“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壓迫與束縛，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開辟道路。”^[3]換言之，正處於上升階段、日益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必然要求與自己相匹配、相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地位和身份，有經濟實力才會有政治及社會影響力，即馬克思深刻指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樣的道理，在新聞宣傳方面民族資產階級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民族工商業需要建立自己的宣傳機構、建設自己的輿論機關，具體表現為：創建資產階級性質的大眾傳媒機構和建立新式聞戰線（諸如報紙、雜誌、廣播），以便發出本階級本階層的聲音、表達本集團本部門的訴求，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才會擁有強勢的宣傳及輿論話語權。清末以來，不斷壯大和發展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他們掀起了辦報創刊的新文化建設、

新思想鼓吹的熱潮，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鄭貫公、章士釗、章太炎、鄒容、秋瑾、陳範等人創建了大量鼓吹革命、號召反滿的報紙期刊，宣揚其推翻滿清、矢志革命的政治思潮。他們認識到僅僅有政治鬥爭、軍事行動還遠遠不夠，仍然需要在思想文化及宣傳輿論上站住腳跟、豎起大纛，為革命運動、反滿鬥爭奠定思想和組織基礎。由此清末民初大批報紙應運而生、大量報館因應而立，掀起國人辦報高潮。

清末，粵東地區陸續出現了不少革命報紙，有力地配合了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兩廣沿海發動的武裝鬥爭。有研究者認為，“粵東是東南沿海口岸的一個重要地區，特別是清末民初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嬗變和西方文化的輸入，粵東地區近現代報刊出版繁多，其報人分布甚廣，活動十分活躍。”^[4]當時受革命黨人辦報創刊的影響，粵東的潮汕梅地區也已經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傳和新聞輿論工作，發動起義的前期便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宣傳基礎、營造了比較濃郁的輿論氛圍。這些都在客觀上、在事實上為以潮州、汕頭、梅州、揭陽、汕尾為中心的嶺東地區強化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新聞宣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進行革命及武裝鬥爭作了思想準備和宣傳動員，營造了有利於革命形勢向前發展的輿論氛圍。通過創辦大量革命報刊鼓吹革命，撰寫文章、評論等為嶺東、粵省乃至全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搖旗吶喊，使得嶺東地區革命風氣漸開、變革思想浸漬，促使該地區人心思變、力圖改革。

據粗略統計，自清末以來潮汕梅地區先後建立大大小小報館、創辦林林總總報紙不低於200份，囿於資金、設備、技術、人才等原因，這些報紙大多數采取不太先進的石版印刷法，產量不算太高、質量也亟需改進，但已邁出了近代報業彌足可貴的第一步。這些林林總總、大大小小革命派報刊，其內容以刊登時事、要聞、京省新聞、本埠新聞、潮嘉新聞、外國新聞、宦海珍聞、社會瑣記為主，欄目包括論說、告白（廣告）、表貼、誌謝、專件、雜俎以至小說、詩歌等，還帶有封建官報的影子，並鑄刻西方報紙的樣子。潮汕梅出版刊印的報紙“從中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勾勒出晚清民國時期，潮汕地區的經濟文化風貌、民風人情以及社會變革及發展。”^[5]總體來說，這些報刊主體是進步的、主流是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報刊這個最為有效的宣傳工具和最為銳利的思想武器孜孜致力於：大力揭發滿清政府時弊，積極宣揚恢復漢人政府思想的民族主義；翻譯和介紹歐美國家民主政治制度，作為改良中國腐敗政治之對癥藥；對國家及地方改革發表意見建議，抨擊借改革之名行封建之實的行徑；目的在於破除封建禁錮、開啟民眾智識、引介西方理論學說、傳播民主思想觀念。

（三）《中華新報》創立的革命形勢、鬥爭情況和歷史經過

1906年，謝逸橋受孫中山先生委派，前往廣東嶺東地區傳播革命學說、開展革命活動、集結會黨力量。這一沿海區域靠近惠州、香港、臺灣，方便軍火、裝備、物資以及經費、人員（包括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的運輸與接濟、支援與藏匿。到達嶺東地區之後，他嚴格遵照孫中山先生指示和囑托，立刻著手擴大中國同盟會在這一地帶的聲威及勢力：積極發展會員、補

充會員和聯絡會員、凝聚會員^①，從事發動群眾、組織起義、策反新軍、建立據點等大量革命活動，在嶺東地區打下了同盟會較為穩固的會黨武裝起義基礎，為之後的“觸發”武裝暴動做足前期準備^②。

在“武功”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時，他深感宣傳輿論之功亦不可少，便致力於“文治”方面的工作，使得“文治”與“武功”齊頭並進、雙重發力。為此，謝逸橋糾集志同道合之人和辦報旨趣相近的同人，共同創辦嶺東地區同盟會機關報《新中華報》^③，以建立“新中華”（含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意，鄒容等人設想建立“中華共和國”）為鵠的，報是新報、人是新人、思想是革命新思想，以報刊為講壇、以文字為匕首、以革命排滿思想為鬥爭武器，進行了大量反清的革命新聞宣傳及報刊輿論活動：極力宣傳和渲染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嚴重生存危機、瓜分危機，點燃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反抗鬥志；介紹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歷史、軍事等學術和知識；討論西方社會迅速強大^④的深層次原因，探究近代中國被動挨打、貧苦不堪的緣故，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和改變中國落後、頹敗面貌的途徑與方法。

報紙、期刊等大眾傳播媒介，作為晚近以來最為先進、最為廣泛、最為實用的輿論宣傳工具和平臺，自然受到了各黨派、各政治集團以及政治勢力的高度重視和大力踐行。自維新派開展改良運動開始，國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辦報創刊的高潮，各地報紙、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汨汨而出，製造並擴大輿論，刷新並洗滌人心。時人感喟說到：“多設報館，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聾聵。”^⑤可見，輿論是行動的先聲，宣傳是革命的手段，報刊不僅可以開通風氣、去塞求通、設報達聰，而且能夠灌輸知識、潤浸新潮、喚起革命。開辦報刊，發起輿論，造成聲勢，鼓舞士氣，激發鬥志，是中國同盟會及其領導人孫中山等的慣常做法。通過創建《新中

① 孫中山早期革命主要依靠的勢力是旅居海外的愛國華僑、接受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留學生和民間反清秘密組織——會黨（如三合會、洪門、天地會等）力量，後期則主要依賴具有民族、民主新思想的編練新軍（特別是中下層軍官及士兵）、地方實力派（軍閥）。謝逸橋到達潮汕後，積極聯絡何子淵、余既成、陳湧波等梅州、潮汕地區會黨頭目——這些會黨頭目具有較大幫會影響和會眾號召力，其從眾往往講義氣、肯拼命但也存在組織渙散、紀律差、信仰缺失等缺點。組織並策劃他們舉行潮州起義和黃岡起義——既可得到支援也可迅速撤離，意圖率先扯旗舉事、造成較大聲勢，以潮汕梅廣大地區為起事基地、再徐圖發展和擴大影響，最終達到顛覆滿清王朝目的。

② 何謂“中華”？是指與滿清封建朝廷截然不同的漢族政權，他們利用明末之大亂趁機入主中原，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全國執政政權。這個概念梁啟超等人最早提出。“中華”二字意為該報是漢人創辦的報紙、隸屬華夏民族的媒體，要求將趁亂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驅逐出去、光（恢）復漢族建立的政權，表現出同盟會“驅除韃奴，恢復中華”政治思想，反映出同盟會強烈的“排滿主義”集體思想。何謂“新報”，表明它與以往封建官報迥然不同，該報是新思想的發布平臺、傳播孫中山革命主義的管道、擴大同盟會革命聲勢的陣地——這裏的“新思想”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理念和革命思想，是同盟會綱領宣揚的喉舌，是同盟會宗旨鼓吹的前沿。

③ 中日甲午海戰的失利，對中國人尤其是封建士大夫、新式知識分子的思想觸動極大、震動極深，無異於思想界的一場大地震。原本是中國“學生”、對中華文明欽羨不已、對中國文物制度亦步亦趨的日本“知恥而後勇”，在短短數十年時間馴至富強，不得不令人浩嘆的同時也進行深層次的反思：日本和中國原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長時間跟隨著中國的腳步，甚至連語言、文字、建築、風俗等都效法、模塑中國。在“黑船事件”爆發之前日本同樣閉關鎖國、對外界固閉深拒，但卻於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唯一一個不但沒有被殖民反而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強國。

華報》這一輿論工具和思想陣地，使民主共和理念逐漸深入人心，排滿革命思想在潮汕地區蔚然風氣，為之後伺機組織和發動革命武裝起義、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做好了思想鋪墊及輿論準備。此外，謝逸橋辦報創刊活動，其本身就是一種新聞宣傳的理論及實踐，客觀上也促進了嶺東地區報紙的勃興以及海外報業的發展。

《新中華報》順應時代、橫空出世，在嶺東地區率先矗立起了一面“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盟會發出的振奮人心的革命口號）的鮮明旗幟，聚集和引導大批懷有顛覆滿清素志、興我中華職志的仁人志士。此後，嶺東地區革命報刊迅速成長起來，發展形勢猶如雨後春筍一般。當時，該報的出版數量比較巨大、發行範圍比較廣泛，不僅覆蓋整個潮汕梅地區而且還波及上海、廈門、漳州、廣州、惠州、揭陽、汕尾以及贛南、閩西一帶——由此輻射香港、澳門、臺灣以及其他東南亞沿海地區（包括美洲海外華僑華人聚集區），諸如安南、新加坡、檳城、泰國。特別地，該報在南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等華僑華人聚集國家或地區）、東南亞華人社區一紙風行、無遠弗屆，因而具有較深的輿論影響力與政治號召力（如東南亞各國許多進步愛國社團的首訂報紙便是該報，如若稍有遲訂則無報可訂，由此可見其讀者數量之多、受歡迎程度之深）。該報的版面或者欄目主要有：一是發布官方公文和選錄其他報刊重要新聞，尤其是對重大政治事件、國家財政政策、行業經濟活動等予以持續關注與重點披露，如國家頒布的鼓勵發展工商業的促進政策；二是發表大量新聞報道，包括京城的和本省的、外埠的和本地的、國內的和國外的，如鐵路修建、海港開埠等民生新聞，與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關；三是刊登商業廣告也是重要內容，如股票、證券、交易所活動、外貿進展、銷售業務；四是登載文藝作品、弘揚白話文學，如雜文、小說、詩詞等，提高普羅大眾的文化水平和文學素養。此外，該報還得到了海內外華僑華人慷慨無私的資助，並成為報紙的忠實“粉絲”；在報紙宣傳作用下，一些富裕僑商出於愛國主義情感和立場帶頭捐款捐物，用以購買槍械、軍火支援反清武裝鬥爭。

總之，秉持“啟發民智，非藉報紙無以廣宣傳”^[8]的理念，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強調“宣傳須用七成而武力只須三成”^[9]。為加強嶺東一帶廣闊區域的革命宣傳和政治引領、激發志士推翻滿清王朝的鬥志、普及孫中山“三民主義”理念以及將救亡圖存、保國強種的思想灌輸人心、浸漬腦質，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迫切要求革命黨人快速開辟輿論新天地、創建思想新陣地，戶牖民智、啟迪民憤；再加上當時「以報刊開民智、育新民」^[10]的辦報活動日漸興盛，粵東地區深受影響，《中華新報》應運而生、恰逢其時。

二、《中華新報》主張的鮮明而篤定的辦報宗旨和宣傳主題

謝逸橋深受孫中山“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興中會章程》之語）的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和風起雲湧的革命排滿社會思潮的影響，加之

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晚近以來堂堂華夏、泱泱大國逐漸淪胥、竭蹶萎靡的危急存亡局面，內心悲憤異常，常思有所作為。故此，他深感列強虎視眈眈、鷹隼環伺致使豆剖瓜分、肢解分割之危殆迫在眉睫，緬甸、越南、印度、朝鮮、阿富汗等先後淪為英法俄德等國殖民地的前車之鑒就擺在眼前，遂萌生民族革命思想、萌發民主政治的理念，形成了通過革命推翻滿清腐朽黑暗統治、建立起嶄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民族革命思想。謝逸橋認為，國家到了神州陸沈、民族淪亡地步，非振起直追不可、非起來革命不可，必須拋棄糜爛不堪、腐朽透頂的清帝國，否則必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因而，他接受並支持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合眾政府”的政治主張，贊同革新鼎故、主張社會革命、要求振興中華，這些都使得他逐步地走在了時代的前列、革命的前列。

謝逸橋等同盟會同志已充分意識到革命需要發動底層群眾，讓老百姓追隨革命者的步伐，響應革命高潮的到來；而這一切的發生與改變，亟需進行思想上的啟蒙和文化上的開智，造育“新民”，建設“新”國家。那麼，在當時就必須通過報紙（包括期刊、圖籍、揭帖、宣傳冊、印刷品）等平臺或載體的大眾傳播媒體——晚近以來最為高效且實用、最為廣泛而持久的大眾傳播媒介，希圖喚醒民眾、覺悟群氓，寄望振作民氣、刷新精神，積極宣傳革命思想、促成各地武裝起義，為推翻走向末路清廷進行思想及輿論上的準備，實際上也是一種宣傳的灌輸與組織的先導。

通過報紙、書籍、發表論著（含譯著）、公開演講等方式和途徑不斷宣傳和極力鼓吹，民眾的國家觀念復蘇、家國情懷重振、愛國主義情愫持續滋長，導致了國民“集體覺悟”的發生和“家國精神”的高漲——這種民族覺醒是指“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歸屬，相信有必要為實現、維持與延續本民族的認同、整合與繁榮，為本民族應享有的地位甚至獨立而努力。”^[1]通過民主和共和理念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以期改變麻木不仁、愚昧無知、蟄伏已久的人心士氣，以期變更一盤散沙、四分五裂、各自為政的被動局面。這個歷史進程中，作為最具偉力的大眾傳播媒體報刊“與有力焉”。

有清一朝，作為“外族”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清王朝非常重視其正統性和天命性，故而極力在文化上、觀念上、思想上、學術上對人民群眾進行奴化教育以便軟化他們的反抗意志。由於封建統治者長期的思想壓製、文化壓迫和持續推行愚民政策，大多數民眾仍處於“民智未開”“顛預無知”的蒙昧狀態。《中華新報》的創辦，猶如給身處黑暗鬥室的國民點亮了一盞燈，給尚在上下求索的救亡救民、自強圖存的潮汕梅地區的革命志士指明了方向，使彷徨者不再彷徨、猶豫者不再猶豫、悲觀者不再悲觀，讓海內外志士仁人對革命的未來和國家的前途充滿希望與力量，播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火種，做好了思想和輿論準備。所謂“新報”，就是與傳統報刊相對立的、與封建官報相區別的，體現在報刊的新內容、新思想、新文化、新版面、新欄目等方面，傳播的是民族革命的新思潮，展示的是西方社會的民主共和理念。

綜觀《中華新報》，其運營模式為：以董事會的形式運作^①，這是當時社會力量或經濟組織，創辦運營報紙的鮮明特色和普遍做法，該報也因循這一辦報模式。其出版周期為：報紙每日出兩大張、逢周一休刊，時間上比較充裕。其發行模式為：在各商埠、港口、碼頭以及學校、書店、報館設有分銷處及代售點，便於訂購或零售；其銷售目標為：主要面向普通民眾尤其底層人群，對於重點部門和重要讀者（如資產階級革命派知識分子、新軍士兵）予以免費贈閱；通過務實的發行手段和可靠的發行渠道，報紙迅速打開傳播局面、銷售量的大幅度提升，從起初發現一千份、不久增至四千余份、最高峰時達一萬三千余份，不少群眾爭相訂報或傳閱——包括書報社或閱報欄等處張貼（由於舊中國文盲人口占人口基數的絕大多數，這種方式便於識字人士當眾朗讀，同樣達到有效傳播的目的）。其廣告模式為：報紙登載商業訊息、積極招徠廣告，帶有一定的商業氣息，但是卻始終不以營利為目標；說到底，它始終是一份以政治為主流、以商業資訊為輔助的報紙。

《中華新報》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是一個人在奮鬥”，而是與遠在日本創辦的《民報》、香港創刊的《中國日報》等同為中國同盟會所屬的革命報刊，這些傲然挺立的同盟會的機關報同聲相和、同氣相連且遙相呼應、互為犄角，成為“系列報紙”和“報紙陣地”，不僅增強了革命派的宣傳實力也給國內外造成極大的革命聲勢。報紙甫一出版，便大肆宣傳倒滿革命思想，傳播資產階級進步思想，強調開民智、新民德、聚民心、鼓民力，號召廣大群眾行動起來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統治，進而造就一個嶄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徹底擺脫中國人任人宰割、被人瓜分的悲慘命運。

三、《中華新報》提出的明確而堅定的辦報方針與創辦鵠的

沒有哪個政黨或集團，無緣無故創辦一份報紙；也沒有哪個企業或個人平白無故創建一家報館。因此，出版一份報紙、成立一家報社總有其內生動力和內在原因，總有其政治、經濟等目的：其一，或是為了政治宣傳與鼓動的需要。這類報刊的誕生往往出於純政治目的，可稱之為“政黨報紙”，視為黨派的機關報和輿論喉舌。它將黨派或政治團體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政治訴求、政治綱領、政治願景、政治目標等公諸於眾，經濟上完全由黨派負擔或者依靠其他組織、集團或個人的補助及津貼，基本上不講究市場及注重營銷。比如維新派康、梁所專門創辦的政論型報紙，盡力宣揚其保大清、保皇帝的保皇主義論調，這種政黨報刊是黨派的宣傳喉舌和鼓吹陣地，其經濟效益、商業價值實際上並不重要也不太受重視，哪怕虧本負債（如採用

^① 即西方國家已比較常態化的股份製公司，發放股票、集資入股。這種辦報經驗及模式有利於經營和管理，較為科學和先進，成為當時世界各地報界普遍和通行做法。報紙發表演論、主持清議、引介學說以影響政局走向及政治取舍，甚至為了尋求政治庇護還有報刊掛靠外國公司及洋商名下。

贈閱方式)也毫不顧惜。其二,或為了組織舉義、發動革命需要。如孫中山等人創辦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報紙就極力鼓吹革命,詳細推介國外成功的革命事例事跡,無情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透頂、行將就木和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和人民幸福的攔路虎,強調必須使用暴力、革命甚至暗殺手段顛覆或推翻反動罪惡的清王朝;此外,也用於聯絡同志、秘密集會、商討對策等,被視為“革命大本營”。其三,或為言論對抗之便利、觀點論戰需要。如保皇派與革命派之間的輿論對抗與政治論戰,二者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是根本對立的,為爭奪海內外群眾的支持和贏得更多的支撐力量(如愛國華僑和新軍將士),他們進行了“針尖對麥芒”般的激烈論戰,表達本黨派的政治理念、傳播本集團的利益訴求。其目的在於用以澄清是非、駁斥謬誤,用以戳破謠言、爭取主動。其四,或是為了追求物質回報和經濟效益。有的報紙或報人辦報,只為追求商業利潤,實現其盈利目標或者說追求營利的最大化,甚至不惜出賣報格人格以黃色消息、花邊新聞、無稽之談等虛假不實、帶有欺騙性的消息或信息充斥報端和見諸版面,如刊登啟事、招徠廣告、發布商品價格、航船線路以及其他各類商業信息。

千百年來,“文人論政”一直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及士大夫群體的傳統和特色,各朝各代都湧現出“清議”或“月旦”之風氣,成為朝廷政治清明、行政開明與否的風向儀與晴雨表。毫無例外地,這樣濃郁的士林風氣、這種強烈的言論習俗也體現在辦報創刊上面——尤其是近代報刊及其所代表的言論界。無論如何,早期辦報和創刊是為了宣傳思想、鼓吹主義、振奮人心、凝集力量,有著明確的辦報目標、言論指向,辦報創刊宗旨性、目的性很強。

《中華新報》自創辦以來,辦報方針明確、辦報思路清晰、辦報目標明晰。就《中華新報》的整體宣傳內容、政治主張和發表觀點觀之:一方面,大肆鼓吹新學新知,造就新思想,造育新民眾,灌輸新理念,培植新勢力,將革命排滿主義思想大肆傳播,使得孫中山的革命理念與治國方略寓於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之中,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對嶺東地區民眾的民主思潮產生作用;另一方面,形成了輿論的勢力,造成了輿論的影響,搶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輿論陣地,與清王朝及其保皇派論調相論爭、相抗衡。

整體讀之,《新中華報》的文字活潑、語言平快;報道精準,消息翔實;評論潑辣、論議雋永;針砭時弊,月旦時政,滿足了廣大群眾對新聞報道、時政要聞、商務信息、商業情報等的需求。報紙上發表的許多文章膾炙人口、深入人心,有利於振刷社會風氣、滌蕩保皇謬論、澄清是非曲直;不少評議為民說話、為民請命,仗義執言反映民生疾苦、操觚發論訴說民眾心聲。報紙內容豐富、版面精彩:大膽揭露清廷腐敗統治、賣國求榮;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以呼籲民族自尊自省、重拾大國信心以及倡言抵禦外侮、驅逐列強為主調,以辛辣、老道的筆調嘲諷貪官汙吏、無情地譴責、鞭笞貪奸喪權辱國行徑,筆力千鈞、剖析犀利,目光如炬、酣暢淋漓,筆鋒常帶濃烈的愛國感情——愛國主義情緒激情澎湃,很受讀者尤其是下層群眾的歡迎和喜愛。

四、《中華新報》與保皇派報紙激烈論爭並嚴斥保皇之謬論

緊緊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滿清王朝、要不要進行流血革命、要不要走民主共和道路等關鍵問題，《中華新報》與保皇派把持的各種報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對壘與唇槍舌劍的辯論。為回擊和打敗康有為等保皇派主辦或養的“保皇報紙”針對革命派報刊進行咄咄逼人、氣焰囂張的政治攻訐與言論攻勢，《中華新報》挺膺而出進行了激烈論戰，澄清了是非、校正了對錯、振奮了人心。一是與保皇派在新聞戰線和輿論陣地上開展激烈爭論與對抗，抗擊和打退保皇派的言論挑釁與宣傳攻勢。當時，保皇派大肆宣傳君主立憲等保皇理論，認為中國只能走君主立憲的日本、英國的道路，光緒皇帝是一位值得信賴和仰仗的開明君主，反對革命派使用武力推翻反動腐朽的清政府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主張。二是極大地擴大了孫中山革命思想與救國理想的傳播範圍，無論從廣度上抑或深度上均有了較大進步，讓更多仁人志士和底層群眾認清了清王朝的腐敗賣國本質進而跟隨孫中山進行顛覆滿清的革命，也讓“驅除韃奴、建立民國”的宣傳觀點更加深入人心。

真理因為辯論而日益清晰，思想因為辨析而日漸正確。進步還是保守，高喊革命還是保皇立憲，在當時來說是一場全社會的大辯論、大討論、大爭論。思想界的孰是孰非、理論界孰對孰錯，在一番激烈的爭論、辨析之後最終塵埃落定、真理自現。《中華新報》挾革命之巨雷與旋風，敢於正視社會問題、積極發聲，敢於揭露黑暗現狀、直言不諱，有理有據地批駁保皇派的荒謬言論，擺事實、講道理地回擊保皇黨攻擊孫中山及其同盟會的各種言論攻擊，該報應接論戰、不懼爭論、挺身而出、堪當革命言論先鋒。其中，該報特別重視遊說海外僑胞尤其是南洋僑商，因為作為“革命之母”的海外愛國華僑華人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清革命貢獻頗巨，是革命黨積極爭取的力量與團結的對象。有鑒於此，該報一方面進行思想灌輸與宣傳鼓動，讓更多的愛國人士聚攏在孫中山革命大纛之下，破除對清廷這個保守僵化、行將就木的封建王朝的幻想，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地推翻這個國家發展、民族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與攔路虎；另一方面面向僑胞進行募捐集資，籌集革命經費，大力引導僑首領、僑社團、僑企、僑商出資辦報紙、辦學堂、辦醫院等，革命黨人將籌集的錢財用於聯絡海內外同志、僱傭各地會黨起義、購買武器裝備、軍火槍械以及訓練武裝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新報》得到了愛國人士、抗日鬥士丘逢甲的大力支持，並與謝逸橋等革命志士保持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丘逢甲，時為晚清清議界之領袖人物，被當時的文壇譽為“詩界巨子”，他積極向報社投稿遞函、發表愛國言論與救國見解，同時也與文化界的文人雅士詩詞唱和，影響和帶動了一大批深具維新思想的人們跟進閱讀《中華新報》，壯大了報紙的政治聲勢與輿論力量，使之在維新變法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作用日益顯現。如此一來，進一

步擴大了該報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同時也提升了報紙在海內外（不僅本地著名而且海外也知名）知名度和美譽度。由於丘逢甲的“力挺”，《中華新報》擁有了更為廣泛的讀者群和更為厚實的社會聲譽尤其在新式知識分子、新軍士兵當中擁有較大政治聲望與言論地位，這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這份革命報紙，讓更多的人接受了這份革命報紙的言論及思想。

五、註重網絡報界輿論界人才，強化報館自身人才隊伍建設

沒有大規模、大批量的報紙、期刊等新聞傳播類的專門和專業人才，就沒有新聞傳播行業、文化出版事業的勃起與振興；沒有新聞人才、傳媒人才的大量培養和不斷湧現，就沒有現代化大眾新聞傳播媒體的持續繁榮、不斷進步，自然也就不會出現當代極其發達與旺盛的傳媒格局與傳播態勢。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報紙、雜誌、期刊、書籍印刷文字讀物也好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互聯網、手機、自媒體、融媒體電子屏幕介質也罷，撐持其間、維系其中的依然是充足且高素質的新聞傳媒及編輯出版人才——具有現代傳媒素養的高素質、專兼結合、德才兼備的復合型人才。所以說，新聞傳媒專業人才的多寡優劣、高下興衰與報紙、期刊、雜誌、書籍、電臺、電視臺、互聯網、手機等或傳統或現代的大眾新聞傳播事業和行業的盛與衰、成與敗、興與亡成正相關甚至正比例。這一點，是已被百余年的中外新聞傳播史、宣傳輿論史、編輯出版史、大眾媒介史證明並將繼續得到證明的。總之一句話，新聞宣傳和出版事業，離不開源源不斷的新聞人才，離不開新聞專業人才智力和勞動的貢獻，他們是新聞傳媒強而有力的補充和馳而不息的支撐，否則行業必然雕敝、事業必定式微。直到今天，面對日新月異、洶湧澎湃的現代傳媒及其先進傳播體系，依然需要大量專業的新聞人才，依舊需要具備深厚理論功底的新聞專才。

《新中華報》自肇建以來，就高度重視報館的不斷完善和自身的人才建設，深知對於一份報紙而言非有“大主筆”和“名記者”難成氣候，在報業的地位往往是由主筆、言論家支撐起來的。因此，該報非常註重新聞隊伍的建設和專業報業人才的培育，致力於打造一支專業化的革命化的輿論引導和政治宣傳隊伍，成為引領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利器和輿論重鎮。謝逸橋等人深知，報紙的事業、報紙的未來、報紙的前途，均系於具有知識、膽識、才識、學識的報業人才於一身；他自始至終相當重視網羅、搜集報業精英和挖掘、栽培報界英才，特別是物色報界領軍人物、言論翹楚人物為其所用，以不斷增強報紙的宣傳力度與輿論力量。

六、結語

綜上所述，晚清時期廣東嶺東地區同盟會創辦的革命報刊及其報人群體的大規模湧出、大範圍出現絕非偶然現象亦非突兀而出，而是西方國家資產階級民主理念與共和思想在中國廣為

流布、廣泛傳播、廣而告之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共和國那一套價值觀點、社會思潮、思維方式和治理手段傳入中國、灌輸中國、引接中國的具體表現，是美英法日德等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現代化報刊媒體（主流新聞傳播事業和印刷出版行業）模塑與復刻、移植與拓展、延伸與傳播中土的必然結果，按照他們的意志強行將資本主義那一套灌輸和克隆中國；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實力和整體勢力在不斷發展和壯大，需要代表本階級利益的宣傳機關與輿論陣地，作為他們核心利益的“代言人”。報刊大眾新聞傳媒輸入和本土化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思想文化的灌輸和工業文明的侵蝕，是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產物——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副作用及副產品，也是國內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民族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還是國際化傳媒的移植與演進的結果（包括早期傳教士來華辦報模式、途徑與手段、技巧及其背後所承載的辦報思想、辦報精神、辦報理念的模仿）。

在清末民初的那個特殊年代，報業的大發展大繁榮有利於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流播與盛行；言論的不斷昌盛與發達有利於打破封建統治者的思想禁錮和文化束縛。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往往將報紙作為宣傳政治主張、革命觀念的工具和灌輸基本常識、覺悟普羅大眾的利器，愛國的先進分子往往將報刊及其製造傳播、擴散放大的輿論、理念視為覺悟民眾、喚醒大眾的得力助手。經由報紙、雜誌以及著書立說的極力鼓吹和大肆宣揚，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優勝劣汰及適者生存、自然進化論等現代國家觀念、民族民主觀點、科學基本知識得以廣泛普及和深入人心，改變了清末民眾的“腦質”。晚清以來，組織、宣傳和領導、發動革命鬥爭都得益於中國資產階級將西方資產階級的各種思潮與學說源源不斷地介紹與輸入，都得益於報紙、雜誌、著作（包括譯著）等的出版發行，對尚處黑暗、智識未開的民眾之思想起到了極大的震動作用，有利於新國民的造育和新智識階級的培育。“晚清報人的個人經歷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經歷，而是一種在時代召喚下的歷史際遇與歷史使命。”^[12] 針對亡國滅種的困境與災難、面對家國淪胥沈浮的時代危局，以謝逸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以筆為利刃、以報為武器、以愛國主義精神為主基調、以民主革命主義為主旋律，大聲疾呼、極力鼓吹、不斷吶喊；他們希冀筆鋒如劍、直指世道人心，寄望思想如炬、照亮前行之路，用以肩負起救國圖存、振興中華的政治天職，用以肩荷起衰轉墜、通識時變的社會責任。革命黨人的辦報經歷、新聞實踐、宣傳理論、革命思想等，至今依然具有很強的歷史鏡鑒價值和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 [1] 劉再生. 謝逸橋：志澄天下，追步國父孫中山 [N]. 梅州日報，2018-10-26.
- [2] 陳旭麓. 近代中國八十年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18.
- [3] 李侃等. 中國近代史 1840-1919（第四版） [M]. 北京：中華書局，1994：227.

- [4] 蔣冬英. 粵東近代報刊及報人史料述評 [J]. 蘭臺世界, 2017 (11) : 88.
- [5] 曾旭波. 汕頭埠老報館 [M].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6: 1.
- [6] 房學嘉. 謝逸橋、謝良牧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 [M].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1: 59.
- [7] 茅海建. 歷史的敘述方式 [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9: 202.
- [8] 許端陽. 汕頭埠最早報紙或非《嶺東日報》 [N] 南方日報, 2016-9-8.
- [9] 路鵬程. 政黨為體, 黨報為用——孫中山辛亥革命時期黨報思想述評 [J]. 2017 (1) : 19.
- [10] 侯傑. 省思與超越——近十年來梁啟超研究之探討 [J]. 社會科學研究, 2004 (3) : 112.
- [11] 楊奎松. “鬼子”來了 [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159.
- [12] 黎藜. 報人的時代際遇與使命——葉楚傖早年汕頭辦報略述 [J]. 傳媒觀察, 2019 (11) : 92.